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第三帝国

英国塞缪尔·约翰逊奖获奖作品

诺尼诺国际奖得主力作

权威单卷本第三帝国史巨著

(英)迈克尔·伯利◎著

李广才◎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第三帝国

(英)迈克尔·伯利◎著
李广才◎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帝国 / (英) 迈克尔·伯利著; 李广才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54-7196-3

I. ①第… II. ①迈…②李… III. 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IV. 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2236号

THE THIRD REICH

Copyright ©2000, Michael Burleigh

All rights reserved.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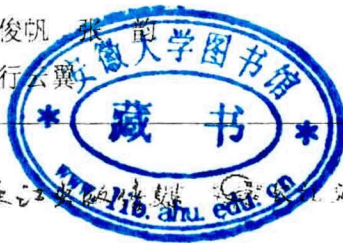
图字: 17-2013-108

责任编辑: 陈俊帆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30毫米 1/16

印张: 26.5 插页: 2页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18千字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雷德里希·艾伯特，曾尽力在一定程度上将战败德国的秩序恢复正常。



1934年，警察头目与党卫军人物，包括未来恶名昭彰的几人。

前排左起：库尔特·达鲁埃格（治安警察头目）、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埃哈德·米尔希、弗雷德里希-威廉·克鲁格（他即将成为波兰中央政府高级党卫军和警察头目）、党卫军队长冯·舒茨；后排左起：党卫军上将沃尔夫、警察局长博宁、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后执掌帝国中央安全局，策划了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



每年11月9日在慕尼黑纪念1923年暴动丧生纳粹“烈士”是党的议程中平庸的低潮。这张1937年的照片显示希特勒和戈林跟随“运动”的“血旗”行进，扛旗者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道旁排列的标塔上刻着暴动中死者姓名，塔顶的坛内冒着黑烟。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共和国。这一事件引发了无数反犹暴行，尤其在维也纳。图片显示一名男孩被迫涂鸦丑化他父亲自己的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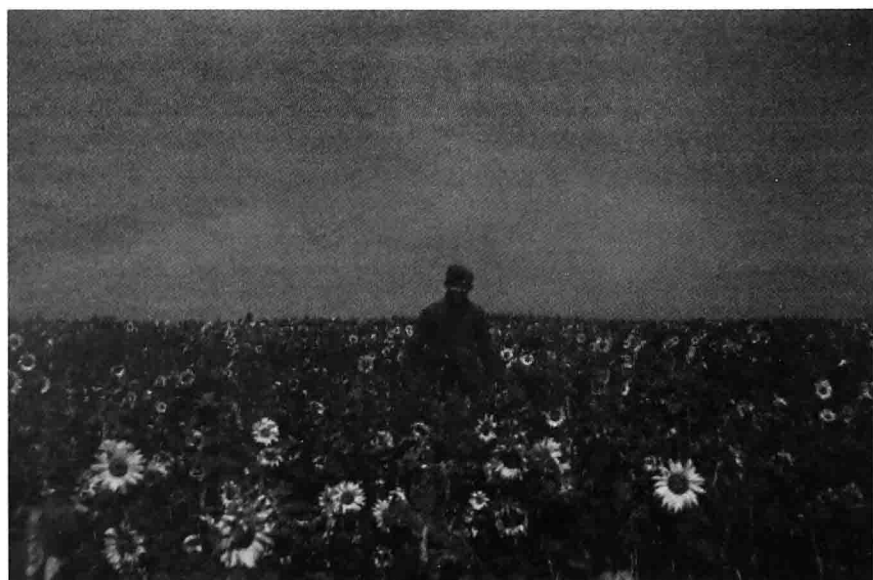


有时，极权主义政权被称作“园丁国家”，试图通过消除被它们认作“外来”或“不适合”的人们，让“适者”繁荣昌盛。图上显示的是第三帝国最高级“园丁”，海因里希·希姆莱30年代末在市场上的花园里欣赏一株郁金香。

首届维希政府。贝当居中，拉瓦尔站在他右边，魏刚站在他右边。



1941年夏，炙烤大地的灼热中，开始了多国部队对苏维埃帝国的入侵。希特勒及其多数将领想象可以在数周内赢得战争。结果却是四次残酷的冬季战役后，红军胜利占领柏林。





德国犹太画家菲利克斯·努斯鲍姆在法国南部集中营内受尽折磨之后，秘密在比利时创作了画作《胜利的死神》中，他将自已描绘为中间偏右的风琴演奏者，他生命中的许多重要的经历都展现在底部的雕带内。这幅画完成后不久，努斯鲍姆与妻子又被逮捕，并被送至奥斯威辛，并于1944年8月命丧于此。



原驻罗马大使、杰出外交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他对纳粹政权提出严正批评，因卷入1944年7月20日的炸弹密谋而被处死。



从“自由欧洲”及英美两国招募的盟国空军空乘人员在扰乱德国经济和迫使德国将本可用于东线的庞大资源用于国内防御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处，美军飞行员在1944年6月进攻诺曼底前执行任务返回途中。

浮士德：暴民鱼贯而上撒旦的宝座；

我将从那里了解我前所未知之事……

梅菲斯托费勒斯：全部暴民鱼贯而行，大步向山顶攀登：

以为自己推动别人，而自己也不情愿地受人推动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浮士德》

当人民从宗教信条出发做恶事时，会比任何时候都做得更加彻底，更加兴奋。

帕斯卡《思想录》

不论它们使用多么现代的术语，如何实际的战术，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都遵循一个古老传统——令我们这些旁观者万分迷茫的是，它们和中世纪千年至福的预言家有着如此相似的特征。

诺曼·科恩《千年至福的追求》

媒体评论

本书是最高水平的作品——尼尔·弗格森最近指出,该书是真正天才史家的成果,这一论断无可辩驳。难以想象还会有比本书更透彻、更敏锐、更宏大的当代史著作。

——《金融时报》

对那个恐怖时期做出了富有可读性和高度知识性的叙述……书中若隐若现的愤慨使其读来令人为之一震……你永远不会对这部非凡著作感到厌倦。

——安德鲁·罗伯茨,《星期日邮报》

他的评论显然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场面宏大……毫无矫揉造作,充满人性关怀。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本书的创作经过辛勤探索,其中史实可靠,论断睿智,证明了神话、自诩为救世主的统治者和乌托邦信念在历史上所能引发的恶果。贯穿全书的血红色主线大抵是由这些要素织就,作者称之为需要汲取的教训,表现出良好的意愿。

——约阿希姆·费斯特,《法兰克福汇报》

贯穿全书,伯利都对细节,对为希特勒欢呼、服务的人们面对的痛苦的人性抉择这一灰色地带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

——弗尔克·伯格翰,《纽约时报》

纳粹主义为何能够在众多德国人当中引发狂喜,为何竟能颠覆常态行为模式——伯利称之为“对正派行为的逆袭”,伯利提出的宗教隐喻是理解该问题的重大关键。

——《旁观者》

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伯利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断，德国当时处于阿道夫·希特勒主导的新的、阴暗的宗教魔咒的控制之下……在这部生动的作品中作者尽力成就了一位有良知的史家的职责，写明了在希特勒的带领下，德国人是如何一步步滑入罪恶深渊的。

——《波士顿环球报》

迈克尔·伯利大而全的历史实际上颇受欢迎。在独创性、宏大视角和雄心方面，该书都无与伦比。我预计这部非凡的著作在未来的许多年内都将无人能及。

——奥默·巴尔托弗，《新共和》

该书不仅是世界所有语言中最为权威的单卷本第三帝国史巨著，而且是一部独创性、诠释性的著作，其中结合了平铺直叙的史实，严谨的分析解释，坚定的知识分子道德判断，以及令人信服的创见。

——迈克尔·安德雷·伯恩斯坦，《洛杉矶时报》

伯利的理论线索朴实无华，却十分可取，而且他对德国国家转型的描述也富有洞见……书中贯穿着恰如其分的分析。

——《天主教先驱报》

一部当代经典……伯利的这部著作是了不起的杰作。他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有格调的作家。尽管本书是一部鸿篇巨制，但仍令读者爱不释手。

——《耶路撒冷邮报》

表现了作者掌握的有关第三帝国的海量知识。他对二战之前的德国的描绘令人叹为观止。

——马克斯·黑斯廷斯，《旗帜晚报》

伯利生动再现了纳粹时代的一幅全景画，强烈地表达了希特勒政权导致的道德沦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新苏黎世报》

迈克尔·伯利创造了现代经典……本书是一部杰作。

——《华盛顿时报》

引言 “对灵魂犯下的极端暴行”

纳粹主义、政治宗教和极权主义

一小撮德国精英和广大普通民众选择放弃他们个人与生俱来的批评本能，而去追寻一种建立于信念、希望、仇恨，以及寻求他们自己种族与民族利益的、情绪化的集体自尊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本书要讲述的正是在这一时刻所发生之事。因此，这是一个具有 20 世纪特征的事件。

本书涉及的是欧洲中心地带的发达工业社会在道德上逐渐以致几乎彻底的崩溃，其人民放弃了为自己着想这一负担，反而热衷于乔治·奥威尔所称的翻版部落文化中的手鼓的擂打。他们相信了恶人，因为恶人做出了承诺，要带领他们大步跃入宏伟的未来，同时使德国本国以及现代社会普遍的问题在暴力之下都迎刃而解。这给德国、欧洲和更广阔的世界造成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但远不及给欧洲犹太人造成的灾难：他们被肆意大规模屠戮，今天我们公正地认识到这是现代史上罕见的恐怖事件。

从局部看，德国遭遇了其在 20 世纪中的第二次重大惨败。用德国公民的生命为大众的愚昧和傲慢野心付出了代价，不管是由于他们直接犯下了恐怖罪行，还是由于道德上的冷漠与无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其他民族也受制于对暴力罪行的妥协、被占领下的屈辱和恐惧，还有强制劳动和奴役劳动，而对欧洲犹太人而言则是大屠杀。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盟国的文化和生产资源都不得不倾斜用于击退和摧毁一个仇视文明、自由、人道、仁爱 and 容忍性价值观的政权，而这些价值观恰是我们所珍视的。敌托邦式的解决德国多重问题的应急之计，最终导致了约 5000 万人在冲突中丧生，欧洲用了半个世纪才从战争后遗症中完全康复，因为疗伤与和解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事关纳粹德国（及其意识形态上的同伙）之外更为广阔的国际环境，这一点已被许多以欧洲为研究视角的德国学者所忽视，因为他们无可厚非地全神贯注于本国的历史遗产。没有任何理由让有关这一时期的史学学术议程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于德国，不论德国的学者为了解和理解他们当代史中这一晦暗的时期做出过多大贡献，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虽然本书对希特勒及其党羽所犯下的终极恐怖进行了一定的思考,但这不仅仅集中于大规模屠杀,此事也许已经并不那么神秘。对此事的过度关注本身就表现出颓废的感官嗜血欲望,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正是当代探究这一主题的部分兴趣所在。作者声言自己对参加大屠杀和大破坏的个人背后动机并无特殊的见解,自从人类历史肇端以来,人们对这种行为已经有了充分的解说。古典文献、圣经、莎士比亚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可以当做当代史学家的创作指南。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进入主题之前就规避了过度宏大的预期。

事实上,《第三帝国》是对一个发达工业社会在长期内,更加微妙的道德崩溃与转型的描述,敏锐的观察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这种崩溃与转型的后果。群众受精英人士中一小撮无良自私者的鼓动,他们逆流而上,罔顾善良真理和疑惑,信任了希特勒这个跳梁小丑,当他发现他对世界的仇恨可以无限推广的时候,他自身可怜的存在也就有了意义。历史哲学家埃里克·弗格林曾将这些群众称作“邪恶暴民”。遭受惨败和持续危机折磨的许多德国人,从希特勒精心选择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中也看到了他们理想中的自身形象。正如希特勒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传记作者康拉德·海登在1944年写道的:“人民在做梦,预言者告诉他们梦见了什么。”我之所以说“许多德国人”,是因为还有别的人,如海登、弗格林,他们的本能、人性或见识都禁止他们心存疑虑,换言之,他们的核心政治或宗教观都阻止他们落入新野蛮状态的深渊。他们二人都死于流亡途中,分别在马里兰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但他们代表着数不清的其他人,被驱赶到布鲁克林、佛罗里达或土耳其。这些人的存在让那些信任希特勒的人们更加触目惊心地暴露了其无以复加的愚昧,尽管这会让人们不加区别地谴责所有德国人。

本书并非首次从政治宗教或极权主义角度研究纳粹主义,只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两种研究方式再度成为时尚,其指导思想更多地得益于许多哲学家、政治科学家和文化思想史学家,而非普通的研究相关主题的史学家之流。因此,书中重申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即试图去辨别那些有关希特勒是否和其侄女有染,是否喜爱他养的狗,或是否为温莎公爵及夫人做过计划等表面叙述底层所蕴含的纳粹现象,而海登和弗格林却对这类细枝末节的问题毫不在意。因为不论多么不合时宜,严肃的学术问题会完全埋在病态矫饰的雪崩之下,而由此流传的平常琐事在六七十年之后仍然不见减少,此事本身就日益为高深的当代观察家带来不安。我们现在从对我们自身时代与文化的思考中,转向使本书内容、核心焦点及结构成型的思想观点的探讨。

古代经典著作作为我们造就了许多政治语汇,给我们留下了诸如民主、专制、独裁和暴政等术语,而这些术语有时却不足以描述某些具有挑战性的新情

况,促使评论家搜索新词,有时无功而返。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尝试尽力去描述北美民主时,就遇到了这一困难:

那么,我认为民主国家面临的压迫类型,不同于过去任何时候曾存在过的压迫;我们同时代的人们在其记忆中无法找到这种压迫的原型。我要寻找一个能够准确表达我对此形成的全部思想的词汇,却无法找到;“专制”和“暴政”都不合适;该事物是新的,既然我无法为其命名,我就必须去定义它。

20世纪2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它是历史,但历史一方面也是思考的结果。

仅仅过去十余年之后,生活在纳粹德国的人们也开始了类似的思考。例如,1934年7月14日,德累斯顿语文学家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和妻子埃娃讨论了屋外扩音器中轰鸣传来的希特勒的演说。克伦佩雷尔写道:“这是疯狂布道者的声音。埃娃说:像约翰·范·莱登。我说:像里恩佐。”他选择的是瓦格纳早期歌剧的一个主人公。

埃娃·克伦佩雷尔并非唯一一个将希特勒与16世纪的再浸礼教派对比的人。另一位日记体作家,后来死于达豪集中营的遁世贵族弗雷德里希·雷克-马勒策文也进行过同样的比较,他于1937年为希特勒作了一番描写,将之描绘为16世纪在明斯特施行恐怖统治的再浸礼教派领袖约翰·博克尔松。其著作的副题为《大众疯狂史》。诸如此类的当代声音会在本书内反复回响,因为这些声音所表现的眼界和见识有时超越了那些以方法论教条或理论见长,而缺乏时代精神的当代史学家和评论家。与宗教类比也打动了那些拥有比阴郁的雷克-马勒策文更平静的世俗世界观的人们。1937年4月,一位匿名作者在布拉格为流放的社民党领袖编制了一份非同凡响的报告,写到了纳粹与基督教会之间的“斗争”,紧随报道过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主义的早期作家,该报告作者直白地将纳粹主义比作世俗化的宗教。他称结果会造就“教会国家”或“反教会国家”,带有自身毫不宽容的教条、牧师、神圣仪式,以及完全地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术语体系,并要求其追随者不动摇地彻底奉献。只有默许还不够;这种政权要求其民众不断地给予肯定,并表现出激情。本“引言”及全书中都将探讨此类观点中的某些内容,但是该报告的作者还引导我们去关注从一战到二战后西德民主建设的其他内容。

该报告的作者为纳粹所施行的道德转型创造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隐喻,这一观念在现代历史创作中几乎仍付阙如,这体现着社会科学不进行价值判断的观点,仿佛道德就是说教,而并非天然存在于人类状况和哲学对其的反映之中。该报告作者将纳粹试图对德国社会进行的道德转型比作建造一座铁路



桥。工程师们无法仅仅摧毁现存的框架，因为这会对铁路交通造成冲击；相反，他们缓慢地更换每个螺丝，每根大梁和钢轨，工作进行的同时，飞驰的列车上的乘客不会将目光从手中的报纸上移开，然而终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旧桥不在了，一座崭新的大桥早已取而代之。纳粹“道德”出现之前，从未出现过如此连贯、紧凑的体系来抗衡犹太—基督教道德或实用主义道德，而这事实上却是缺乏普适性的极端民族主义。然而其中的暗示也令人忧心忡忡。

将政治运动看作具有礼拜仪式、仿神学和善与恶的类宗教或代宗教，由来已久。较早之前，托克维尔曾将法国革命比作“宗教复苏”，称之为“一种宗教”；它“如同伊斯兰教一样，有其信徒、战士和殉道者，踏平了整个世界”。由于对立的原因，罗伯斯庇尔也同意这种观点。在试图让其信徒中的怀疑者和灭亡论者绝缘革命时，他写道：“能够消除或取代这种[怀疑论]有害本能的，能够弥补人类权威不足的，就是印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宗教本能，由高于人类的力量赐予人类的道德准则进行裁决。”这并非政治无法企及的煽动群众热情的极端伎俩，更不是要篡夺神圣话语权、仪式权以提高士气。因为这些雕虫小技简直微不足道，因为毕竟在发达民主国家和发达专制政权中，说教和自以为是的正义都已司空见惯。然而，这反映了一种观念，认为上天已降下某种特别的社会秩序，以使幸福常驻世间。任何反对这种信念的人不仅有错，而且参与了魔鬼的阴谋。这种指责发源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内部，及两者之间最初的冲突，撒旦开始只是试探人类的天使，后转型为邪恶的化身，潜伏于任何异端的表象之下。反对者不仅是受到了误导，因而无法劝说，只能灭绝，但他们所做的仅仅是生存。

那些根本没有民主或其民主令人生疑的帝国与国家，常常披上宗教的外衣，这让从那不勒斯到波兰的以救世主自居的民族主义者颇为懊恼，因为他们眼中的民族国家正是获得日常的类宗教式肯定的国家。集中关注民族与国家或某种价值观的公民宗教，曾在19世纪的欧洲和自诩为现代以色列的北美十分普遍。它们夸张的实体存在点缀着许多欧洲城市的中心地带，这一点任何曾在罗马市中心登上犹如婚礼蛋糕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纪念碑的人都会认可。当时，如意大利的统一日和德国的色当节等民族庆典日也流行一时。从本质上看，这些纪念碑与纪念日对于救世主式民族主义支持者而言，显得空洞而缺乏灵魂，他们需要让人民永葆高涨的热情；他们还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在应包含哪些人、排斥哪些人、代表谁的利益方面漏洞百出。被排除在外的最大群体——劳工，全部或部分地组织起工会或政党。劳工自身也形成了另类的狂热崇拜仪式，而他们所坚守的意识形态信条却是激进地反宗教的。处于正式公民宗教边缘地带的人民由伟大善良人物支配，但他们也敌视有组织的劳工，常常构成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的潜在力量。

一战，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灾难，为 20 世纪大多数的恐怖埋下伏笔。本书从一战开始，埃米尔·涂尔干认为它所造成的情感波动如同宗教体验中的必要过程。大战及其引发的失常后果加强了政治学中的类宗教学派的复兴，在极端危机时代展现出最大的感召力，正如中世纪的千年至福说或审判日前需要等待千年的信仰，会在社会大变动、大紊乱中兴盛一时一样。死者悲痛欲绝的亲人会来到每个城市或村庄矗立的纪念碑前寄托哀思，这些纪念碑用金石记述了过去的英雄史诗。真正无法表达哀思的人们会在精神世界中寻找答案，观看照片贩子“捕捉”到胶片上的行进中的士兵们犹如幽灵般的影像。这些幻象和诱惑在政治上都有其同类。一战拖垮了自由文明，而恰是自由文明导致了一战的爆发，这就使某些人逃离战争的混乱和恐怖，转入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以继续 1789 年未能实现的承诺。虽然欧洲的极端保守主义使一战提前爆发，但战争、混乱和革命的组合，也在大量的死亡之中延续了生命，毕竟新一代蛊惑人心的救世主们，残暴、自觉，能操纵别人，却下定决心不去重蹈前人的覆辙。

这些虚伪救世主最初的使徒只是一伙亡命之徒，但在真正冲击到人们存在感的本体论危机的影响之下，他们迅速在人民大众中扩展，为他们提供鼓舞的是法国革命以来所未见的强烈情感投入，还有在战争或危机中才会出现的间歇性高涨的民族热情。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和德国纳粹主义者，及其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较为次要的模仿者们，都支持信仰的政治，并将他们的偶像、扈从符号和卍字供奉在已经部分建成的民族主义神坛上。并使用大量的爱国语言表达其诡异的目标。传统主义者可以被吸引到这里，因为这里有他们相当熟悉的东西，标新立异者因同样的原因，也被吸引而来，同样被吸引来的还有那些已将暴力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怀旧念想，或有洗刷罪孽的伪哲学的人们。

战争阵亡者们悲戚的墓园文化，已转变为好战子遗们的狂热崇拜，其中一战的被难者们与极右翼势力自己恐怖暴行导致的伤亡者无缝衔接，然后这些死者就会在宏大的仪式上，以严整的步伐走入永恒的荣光。其中留下的矛盾无人评说，无人探究。青年的病态取代了哀伤。令人生畏的大众伤感，加上愤怒、恐惧、仇恨和自怜，取代了寻常的正派政治、实用主义、财富和理智，以及国家命运应由独立个人做出的主权判断来决定的思想。对于本能的信念、信仰、情感和服从，带来了辩论、怀疑和妥协。人们情愿去屈从于群体或群众情感，包括昭然若揭的肮脏丑恶的种群心态。在虔诚的信仰者中，一个春天永驻、遍地英雄和恶魔、充满火与剑的神秘世界——保育园中的幻想，取代了现实；更确切地说，是侵犯了现实，让犹太人、斯拉夫人、资本家和富农的野蛮形象占尽了人们的想象力。这是儿童政治游戏，而成人却乐此不疲，他们厌倦了战后平

淡的自由民主氛围，百无聊赖，因此即使要他们以个人自由为代价，他们也愿意将英雄姿态和英雄政治当做一种剧场特技加以接受。在更严格的意义上，这种政治形式十分现代，强调形象和民族感情，因为欧洲的煽动家们都狡猾地知道他们制造群众信仰所需要的操纵技巧，他们知道群众、旗帜、歌曲、符号和色彩所能产生的影响力。这些人是政治艺术家。

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和1933年德国纳粹政权的出现，标志着对这些政治宗教严肃思索的开始，也正好结束了其存在的传闻性直觉。关注此事的思想家常常是那些对唯物观解释政治现象十分不满的人们，或是那些认真对待思想的人们，他们不认为思想从属于“事实”或所谓的“更深层”社会经济结构，仔细探究之下，这种结构无法说明任何问题。正如罗素写道的：“要了解布尔什维主义，仅仅知道事实是不够的；培养新精神的共鸣或付出想象很有必要。”

20世纪最早倡导将政治运动看作宗教的学者有德国天主教徒瓦尔德马·古里安(1902—1954年)和埃里克·弗格林(1901—1985年)，他们于1937年和1938年相继逃离德国，分别来到圣母院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执教；法国伟大的自由保守派思想家雷蒙·阿龙(1905—1983年)；以及雅各布·塔尔蒙(1916—1980年)，他是工作于英国和以色列的波兰籍犹太人，就这些问题曾写过重要但存在缺陷的三部著作。在法国、美国和德国，对于弗格林和阿龙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在以色列境外，一定年龄的学术人士了解塔尔蒙，而古里安却几乎被人们遗忘，尽管他写作了不少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佳作。

其中的某些思想家，各自或多或少地不愿被看作“保守派”，他们亲身体验过极权主义现实的经历。拿弗格林来说，他于1937年发表了两部著作：《知识历史中的民族思想》和《民族与国家》，但这两部书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因为其中不仅强调了纳粹民族理论在科学上的不足，还将纳粹主义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都是更广阔层面上精神抑郁的症状。他的下一部著作《政治宗教》，将纳粹主义描绘成现代固有的异端，即就在此时此地承诺救赎；该书甫一印成，就被盖世太保收缴。盖世太保开始到弗格林家中骚扰他和妻子，没收了他收藏的《共产党宣言》等违禁书籍，但当他提议是否也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并收走时，却被盖世太保婉拒；他后来不无讽刺地提到，他的提议只是反映了他广泛的学术兴趣所在。盖世太保试图没收他的护照，又在他的屋外安插一名暗探时，弗格林决定逃到瑞士，进而逃往美国。这些人并非是在论证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同于宗教，因为它们都缺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的深度，而且它们集中关注的也不是超越宇宙的存在，泥潭中也有水，但它不是海洋。弗格林认为所有这些政治运动都是因为世界上缺乏宗教而造成的后果；他认为世界已经腐朽了，类似于此时此地救赎的基

基督教异端思想，融合了后启蒙时代社会转型的教条而大行其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未将“君权神授”作为其政治使命最终合法性的来源。然而，政治宗教都强调“现世”，这也是其与旧基督教的区别特征之一，但政治宗教试图取代基督教的价值观，也与教会进行各种交易。它们的功能也与一般宗教不同，除非人们将这些政治宗教激发的热情等同于对足球队崇拜。事实上，它们夸张地模仿了宗教信仰的根本模式，在现代社会中集体被神圣化，如阶级、民族或种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上帝而成为大众热情膜拜的对象。一个统一的国家，清除了一切种族或政治污染，在外部看来毫无道德缺陷，变成聚集在一起的衷心信仰者，在倾听新“领袖”动情的有力演说；一名当时的意大利人曾将此描述为“对人类灵魂犯下的极端暴行”。

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这种思考方式不但从未没落，反而显现了日益强大的迹象。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诺曼·科恩、乔治·莫斯、詹姆斯·比林顿、詹姆斯·罗兹、汉斯-约阿希姆·加姆、乌里尔·塔尔和克劳斯·冯东等人借此展开了重要的研究，而“信仰政治”的普遍属性得到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的关注。塔尔英年早逝，莫斯活到暮年，他们两人的作品都对本书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政治宗教的研究兴趣目前在许多国家得到复兴，索尔·弗里兰德、菲利普·伯林、埃米利奥·让蒂勒、迈克尔·利、克劳斯-埃克哈德·贝尔施、汉斯·迈尔、尤里乌斯·舍普斯和让-皮埃尔·西龙璠等范围广泛的历史学家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政治宗教也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兴趣，虽然他们的全球视角常常淡化了有意义的比较。不幸的是，对政治非理性的研究变得过于理性，也可以说是受到了貌似理性的解说方式的欺骗，这一点不乏先例。

和海量的其他历史文献有其分类一样，关于政治宗教的历史文献也有其分工。一类研究涉及的是各类政权如何利用神圣语言和仪式，即使它们自身都对宗教深恶痛绝。在这一层面上这样看待纳粹主义最容易理解和把握。最新出现的一类研究课题研究对象是政治宗教对道德产生的作用，虽然摒弃造福人类数千年的价值观的后果无一例外都是灾难性的，但仍有某些人，因无法消除阶级或种族印痕，不能被改造成新人，而被抛弃或谋杀。这里史学家使用了传统的历史编年学，因为道德气候有着模糊的边界，生活在 60 年代或 80 年代的人们与其生活在 1914—1918 年或 30 年代的先辈们一样，都会对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进行评价。学者们对各个时代中个人的抉择产生了日渐浓厚的兴趣，为海德格尔、海森堡或施佩尔等人撰写了引人入胜的新传。人们还对纳粹统治下人种改良对医疗道德的影响很感兴趣，纳粹在东线战场上将普通人转变为半人的捕食者；对慈善的利用、职业道德以及对社会正义的追求都引发了人们的兴趣，纳粹利用这些方式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激励他们，回报他